

石仲泉 著

我观

邓小平

增订本 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014055954

A849
65-2
V1

石仲泉 著

我观邓小平

增订本 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43953

A849
65-2
V1



作者简介

石仲泉 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1938年5月出生，湖北红安人。195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1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做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64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8年底调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年调入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职称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首席专家。其他社会兼职有：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史党建学科组副组长；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党校、军校兼职教授。

石仲泉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和党史的研究，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等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长达八年之久。个人主要专著有：《我观毛泽东》、《我观周恩来》、《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我观党史二集》、《长征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论》、《艰辛的开拓：石仲泉自选集》等。合著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等。主编的著作有：《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共八大史》、《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下册）等。新近出版《我观党史》（三卷本）、《党史热点面对面》、《我观毛泽东》（增订本）。有多本著作和多篇论文荣获国家级图书奖和优秀论文奖。

增订本序

石仲泉

2013年和2014年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改变中国迄今最有影响的两位历史伟人的“逢十”盛大纪念的两年。彩焰送银蛇，暖九迎金马。2014年在丽日吉祥的气氛中到来。

10年前，在2004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199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以《我观邓小平》新版面世。弹指一挥间，在今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我观邓小平》扩容后，以增订本形式重新与广大读者见面。

这10年，是我完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10年。本想退下来多多休息，但实际上退而未休，学术研究的活儿更多，写作更忙了。这10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三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即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由龚育之（在2007年6月去世）和我作为首席专家，领着课题组（由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干了五年，到2009年10月以上下两卷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出版。其间，绝大部分精力都在干这个课题。由于承担这项任务，其他研究计划不得不相应调整。但是，经过这五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的深入研究，也使我不仅对这个问题有了系统把握，而且对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因此，还是得大于失。

二是继续“走走党史”，对民主革命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

2 | 究。在主持党史研究室业务工作期间,对党史的研究着重宏观把握,对微观方面的问题没有大面积地展开研究。退下来后,提出“走走党史”理念,着重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现场考察。如对党的五大、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央苏区的开创和发展、湘鄂赣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川陕苏区、三个方面红军的长征、延安与抗日战争、皖南事变、延安整风运动、党的七大、转战陕北、西柏坡与建国等重大问题,都通过“走走党史”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从而对民主革命这段历史的具体问题有了更多话语权。2013年11月,还走了当年西路军征程的全过程,从而对西路军史争议的一些问题有了定力。

三是党的重要历史人物研究。这些年研究的党史人物涉及10多位,但研究较多的,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邓小平。对邓小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段时间:一是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二是纪念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周年。在这两段时间都写了一些文章,讲了一些看法,特别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写的文章更多一些。

在10年前写新版的话时,我说过: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阐发。这些年,不仅我个人深深感到,而且相信许多人都有这个看法:如果不是邓小平以他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国家在短短30年赶上日本,在经济发展总量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绝对不可能的。仅此就足以说明这位历史伟人对于当代中国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因此,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对他的历史功绩应当大书特书。

这10年间,我对邓小平的研究,主要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

(一)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起,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两个“守护神”

2012年8月上旬,我们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在新疆喀什召开第19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我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在中国,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只能是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别的任何政治力量既不可能凝聚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各民族人民,也没有能力和经验来把国家治理好。尽管目前党内还存在不少弊端,许多事情也不尽如人意,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贪腐败类,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个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有宏大的奋斗目标、先进的理论指导、优良的思想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聚集了中华民族绝大多数的各类精英。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和民族的脊梁,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治国家。别的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正能量和大优势。多党制轮流执政,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在中国不搞多党制,并不等于共产

党不需要实行民主政治,不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时代的进步、历史的经验和理论的逻辑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若要使自己成为长期执政的党,就必须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而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有邓小平的敢于担当的政治勇气和精神状态,再加上精细的战术操作,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取得更大、更重要的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应当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器。

在那次讲话中,我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使自己成为长期执政的党,就必须任何时候都要维护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用老百姓的话说,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就不会有中国人民的今天,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今天。在今后漫长的征途上,不管遇到怎样的曲折,也不管会对某些历史事件做出怎样的结论,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不能动摇。毛泽东和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是命运共同体。动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执政资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守护神”。要维护,但必须是“科学地维护”,即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凡是他们正确的东西,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允许人家善意的即使是尖锐的批评,以作为历史教训认真记取。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这种科学态度,始终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最大利益,那么,中国共产党将无敌于天下,永葆执政青春。现在,我还是坚持这个思想,而且信念更加坚定。

(二) 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不能淡化和削弱

十七大报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理论和重大战略思想加以整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科学概念,将已有的创新理论和未来一个时期可能提出的创新理论统统地包括进去。这是顺应党心民意的正确决策。但是,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称谓,怎样认识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关系呢?能否因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不需要突出邓小平理论的作用和意义呢?我以为,不能。在2012年8月的喀什会议上,我讲了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他创新理论之间至少有这样三层关系:

第一,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创性理论,其他则是传承性理论。邓小平理论在十四大时本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 | 理论”，到十五大时才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括为“邓小平理论”。十六大报告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升为党的指导思想时也说得清楚，它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十七大报告论述科学发展观时又明确指出，它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就是说，这几个创新理论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根据实践的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所侧重，因而形成的理论形态，既一以贯之、承前继往，又与时俱进、启后开来。这样，邓小平理论和其他创新理论的关系，就是原创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关系。

第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性理论，其他则是递进性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最初源于邓小平。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三大报告讲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实就是指邓小平理论。正是有了这个认识基础，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称谓，十五大报告将其简括为“邓小平理论”时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①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以为，就回答上述三大问题的一以贯之而言，这几个创新理论坚持和丰富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因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就上述三大问题本身来看，既是与时俱进的关系，又是前后递进的关系。只有前面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才有可能主要解决后面凸显的问题。因此，主要回答上述三大问题形成的三个理论形态，具有本源性递进性关系。

第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创新的综合性理论，其他则主要是以专题创新形式展现的综合性理论。共同点都是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基本问题，各自的特点则在于，邓小平首次以全面创新的形式“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是“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科学发展观则是“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①显然,这说明三个创新理论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以及深度、广度和新度是不完全一样的。鉴于这个特点,我在喀什讲话中将邓小平理论比喻为主干性理论,其他则是支干性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犹如参天大树,必有主干和支干之分,不可能都是主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创新理论尽管都很重要,但也不能不分出主干和支干。既然如此,那么邓小平理论毫无疑问地就是其主干性理论,因为它是最先提出的,具有原创性和本源性,因而具有主干性。其他则不能不成为支干性理论。树木分主干和支干,不是贬低支干,而是各有不同功能所致。它们通过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并维护参天大树。大自然有这样的天然分工,在社会科学方面,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也是这种情况。邓小平理论作为主干性理论,起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支撑作用。没有邓小平理论,就不可能有其他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棵参天大树也就不可能产生和存在。

因此,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丝毫也不能贬低或淡化邓小平理论的作用和意义。那种认为不必要再突出邓小平理论的倾向,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历史相违背,也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三)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我个人对南方谈话一直是予以很高评价的。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时,我进一步认为:

首先就其理论价值和历史作用来说,南方谈话可称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到新阶段的标识性著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代表性文献。它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是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有比较全面论述的著作。它深刻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为邓小平长期思索的问题,诸如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发展速度、发展特点、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廉政建设、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主要倾向等都涉及了,因而是一篇将其思想形成比较系统化的综合性文献。同时,它及时和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后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站在了当代中国理论前沿的高地上。它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比如:“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论,“社会主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64页。

6 | 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论等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将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作为邓小平理论主要载体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篇幅最长、理论性格最鲜明的著作,堪称邓小平理论的代表作,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标识性著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代表性文献。在此之后,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崭新局面,党和国家的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

其次,南方谈话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历史虽然过去了20年,但洪钟巨响,声犹在耳。重温南方谈话可以获得许多历史启示。这些历史启示,也可以说它具有五大指针的作用:一是消除顾虑、解放思想的指针;二是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指针;三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针;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针;五是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指针。据此,我以为,对南方谈话要反复学习、长期宣传,让国人牢记其深邃的思想和长鸣的警钟。

(四) 邓小平的“金砖四论”,对使邓小平理论称其为邓小平理论具有特殊意义

“金砖四论”是我对邓小平理论中特别重要的四大理论给予的形象称谓。这“四论”为: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是社会主义主体论;四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我通过对邓小平理论的各个具体理论的深度研究,认为各个具体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都作出了这样那样的回答,有其重要理论价值。但是,就在理论上最具原创性的,能使邓小平理论称其为邓小平理论,使其享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殊荣的特质形态,同时又在实践层面上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和进步发生直接重大影响、并最具统领全局意义的理论观点,主要为上述四大理论。在1999年,我已开始强调这四大理论的作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正式将其称之为“金砖四论”。

对于社会主义主体论,我特别强调它的作用和意义,认为这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在我看来,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允许其他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非社会主义形式共存并进。这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此外,在文化政策上,坚持主旋律和多样化的统一;在政党关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政治关系上,随着港澳回归祖国,我国的政治制度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在少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等等。这

种状况会存在相当长时期,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会改变。我将其概括为“社会主义主体论”,是相对于过去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观而言的。“社会主义主体论”的表述可能不那么规范,但就与它的对立面“社会主义纯粹论”作参照来说,其内涵和意向是清楚的。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正是因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在不断完善这样的制度和政策,它成为了我们国家取得巨大成绩和进步的一个强大推动力。

(五) 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有特殊伟大贡献

在 2008 年底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时,我撰文论述了邓小平的三大贡献。

一是开辟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决定了具有统领全局的三件大事,可视为他披荆斩棘,开辟改革开放道路的三把火——第一把火为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第二把火为支持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第三把火为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形成全国对外开放格局。

二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基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为其原生初始形态的奠基人,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父”。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他提出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也使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的“金砖四论”,无论在理论指导上还是在实践运用上都对改革开放 30 年的成绩和进步发生了最直接的重大影响。

三是奠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基础。邓小平规划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奋斗目标,对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八个字的内涵大多有具体论述,或促进了其思想的形成,为我们国家逐步实现这八个字的目标作了巨大努力。我们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显然是与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伟大贡献分不开的。因此,我引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现代中国,就改变神州大地的面貌言,这个巨人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功绩。

(六) 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历史“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科学解读,进一步论述邓小平与毛泽东也“两个不能互相否定”

还在 2009 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时,我就撰文提出新中国 60 年的历史发展,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 年”。对前“30 年”,邓小平从不同角度作过两个总体性评价,认为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都说是成功的。对于后“30 年”,胡

8 | 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作了全面阐发。据此,强调要辩证地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两个“30 年”的历史关系,反对两种倾向。即一是将两个“30 年”完全对立起来,或以后“30 年”否定前“30 年”,或以前“30 年”否定后“30 年”;二是将两个“30 年”简单地直线化,认为后“30 年”是前“30 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 年”对前“30 年”有拨乱反正,是转折性发展。这两个“30 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很大不同。

2013 年初,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我们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简言之,即“两个不能互相否定”。

由于那时报刊一些文章对这个问题还缺乏深入解读,理论界和社会上对“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有不少议论。2013 年 6 月中旬,我到延安干部学院讲课,有学员提问对“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如何看?我在回答时提出一个观点作为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理论支撑。我说:人类历史有其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也是如此。就其自然属性言,无疑有延续性、连贯性。就其文化属性言,对历史的具体内容既有继承和发展,又有拨乱反正、改革创新,也就是说,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对两个“30 年”作辩证比较,总的来说,前“30 年”为后“30 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 年”是前“30 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并不是说不承认前“30 年”发生的曲折和挫折,更不是要重新评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如果产生这样的认识,则是误读了“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因为 1981 年的“历史决议”已对前“30 年”的历史,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已有科学分析和明确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党中央都明确地坚持、维护“历史决议”。因此,不能将“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同坚持和维护“历史决议”对立起来。由于前“30 年”的历史主要是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探索的,后“30 年”的历史主要是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开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不能将邓小平与毛泽东对立起来;对这两位历史伟人也是“两个不能互相否定”。

2013 年底,我有幸参加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聆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待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观点,着重讲了三个重要问题。

——一是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他认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持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

——二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提出四个不能:(1)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2)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3)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4)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状况、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他说: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这三个观点,虽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由于多年来没有这么集中地强调,更没有以这么简约、鲜明、清晰、坚定的语言来表述,因而又有几分新鲜感。对待党的历史要坚持这三个观点,对待党的历史人物也要坚持这三个观点。这既是评价毛泽东的科学指针,也是评价邓小平的科学指针。

以上感言权且作为增订本之新序。

作者

2013年12月31日于北京万寿路宅中

新版的话

现在,映入读者眼帘的《我观邓小平》,是上个世纪末的拙著《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的增订新版。

长期以来,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思想理论。1990年11月,中共党史出版社为我出版了《毛泽东的艰辛开拓》。1993年10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我著的《周恩来的卓越奉献》。这些书中的文章,大多是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期的产物。1995年,调至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后,主要研究方向放在研究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因为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第二卷。同时,过去的党史人物的思想理论研究也在继续。因此,1998年6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主要是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写的论著的合集《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在2001年纪念党的80周年诞辰之际,济南出版社又将我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期间写的论文结集出版了。这样,20多年的笔耕,总算有了部分收获。

在济南出版社出版我的党史论集时,我就在琢磨,过去出版的几本书的书名是否缺少特色,或者说,缺乏个性?回过头看,不那么满意。因此,对在济南出版社要出的书取何书名,不能不动点脑筋。该书以《我观党史》之名出版后,听到的反映大多表示肯定。2003年初,我不在领导岗位后,有的出版社想再版我过去的书。这时,我开始产生了要不要将再版书改改书名,使它更添个

2 | 人色彩的想法。同时也在考虑是否把已写的书和准备写的书整合成系列。其中,首选就是“我观”系列。去年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中共党史出版社拟再版《毛泽东的艰辛开拓》,这是第四次增订版了。经反复“推”与“敲”,最后下决心将该新版书改名为《我观毛泽东》。这样,“我观”系列就准备“登台亮相”了。中共党史出版社还告之,这个“我观”系列的已纳入他们的出版规划。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按照我们民族的习俗,逢 50 年、逢 100 年这样不可多遇的年头,都有大庆祝大纪念的习惯。党中央对于隆重纪念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也有安排。对于出版社来说,主要的就是出书。中共党史出版社拟再版我过去写的邓小平那本书。承蒙湖北人民出版社慨允,《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的增订再版改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来完成。这次再版增加了 7 篇文章,包括为纪念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写的新论文。再版后该书并入“我观”系列,书名就定为《我观邓小平》。

对于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和研究,我在为出版《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写的“前言”中,已经作了叙述。在那里,我将自己的认识和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目前的研究仍属第四阶段,还是又形成一个新的阶段,我没有作深入思考。但是,对于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这些年逐渐产生了点新的想法。

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作了高度评价,不少学者也写了研究专著,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放眼世界,看看我们国家的巨大变化,再翻翻过去的马列著作和我们党的历史文献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论述,我深深感到目前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还阐发得不够。我们的思想还有不少框框。如江泽民所说的,还需要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三个解放”的思想,尽管是就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言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三个解放”思想的精神具有普遍意义,也可用于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使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就此而言,我以为,对十五大讲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应作新的解读;对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那些基本观点,应更充分地评估其理论意义。尽管现实生活与理论认识存在不小的反差,那是属于实践层面的问题,不能因此影响对有关理论价值的充分认识。最近,我大胆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原生形态;邓小平理论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即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当代形态。这个想法,在本书再版时新增的 1998 年

11月撰写的《对历史伟人的历史比较》一文中已露“端倪”；在2002年1月发表的论文《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中作了初步论述；这次在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写的新作《邓小平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新形态》中作了进一步阐发——具体观点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是在爬格子。前两年，到有的高校、党校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有的年轻教员、学员读过我写的一些书，包括上面那几本，问我：许多学者的研究都选择离现实、离政治远一点的课题。您却将主要精力放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周恩来精神，直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直接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的研究上。您怎么看待您的研究，您是否有过作这样的研究值不值得的想法？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也促使我对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作回顾和反思。

我出生在湖北荆州的江陵农村，家境不算很贫苦，也不富裕。上小学，家里还供养得起。要上中学，家里就负担不了。是小学校长劝说父母让我到沙市去上中学，靠助学金和老师资助念完中学课程。6年中学是我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由于家庭影响，我一直是本分老实的孩子，学习比较用功，不调皮捣乱，关心时事，进取向上，是班级干部和三好学生。15岁初中毕业入团，18岁高中毕业入党。上大学，填志愿，学什么？班上比较多的同学都选理工专业，也有不少老师和同学希望我学理工。但我在班上文理学得都还可以，不想偏废某一方面，第一志愿选学哲学，这在全年级200多名同学中可能是唯一的。报考什么学校？当时的想法是：要上就上名牌大学；考不取就去工作，反正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早工作，早养家。那个暑假，没有回家。因为在农村的家离沙市有六十里路，还要过两条江河，一条是浩淼长江，一条是它的支流虎渡河，在50年代，交通很不方便。上中学就是寄宿住校，寒暑假才回家。这一年（1956年），我们回不了家的同学就住在学校等候录取通知书。8月，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9月，就到北京来上学了。

在北大，我呆了9年，5年读本科，3年做研究生，1年参加“四清”运动。中学的经历已使我与政治有了一点缘分。在大学选专业就偏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大毕业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哲学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除在“文革”期间劳动下放远离政治外，后来分配工作在基层党校教马列经典著作，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搞理论宣传，又回到了与政治相联系的圈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调至中央文献研究室（当时叫“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办公室”），主要参加毛泽东、周恩来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工

4 | 作。这是我真正学术生涯的开始。从此，也就走上了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着力研究、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术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这自然也成了研究的对象。这条研究道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这么个经历形成的。

作这样的学术研究，一是有一定风险，二是不一定有成就。这都源于与现实政治联系太密切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才有不少人将此种研究视为畏途。产生这样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我们这些人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批斗“涉嫌”政治错误的同志的场景历历在目。有些人至今还心有余悸。但是，君不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与政治毫不沾边而作“纯学术”研究的老专家，不是照样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那段历史应当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像“文革”中所喊的，隔七八年再来一次，还有第二次、第三次，云云，那真是我们民族的不幸。这20多年来，有了从未有过的政治民主，“文革”那样的劫难没有再发生。因此，作这样的研究，只要不危害党和国家的利益，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不会有大的政治风险。

至于学术成就问题，那就要看个人下的功夫深不深。我们党的一些被公认的理论大家，不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攀登上学术高峰的吗？同样的，离政治较远的学术研究，如果不下“铁杵磨成针”的功夫，那也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就。当然，作这样的研究的难度比其他的研究会大些，这也是事实。这就更需要多下功夫。我相信，皇天会不负苦心人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把写这方面的文章仅仅看作是搞宣传，尽管这样的文章会起这方面的作用。作为学者，对凡有学术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学问来研究。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都将其视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将时论作史论来写，将政评当美文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登峰不跟风，创新不妄论。放眼未来，坚信历史，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这种心态，有了这种境界，有了这种精神，作这样的学术研究，也会乐在其中。这样的成果，不会成为像胡乔木说的那种被人看不起的“宣传品”。学无涯，作这样的学术研究，犹如在茫茫大海中驾驶一叶扁舟，既有弄潮的风险，同时会感受到弄潮的乐趣。如果能发现迷人的小岛或抵达美丽的港湾，那更会其乐无穷。因此，反思走过的学术研究道路，尽管对没有取得大的成就而深感惭愧，我仍想借用胡绳的话说：无悔。

新版《我观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原有的文章，除出版社责任

编辑将发现的个别文字印刷错误加以订正外,我没作任何改动,让其保持原貌吧。 | 5
新增文章的观点,可能较之原版书中文章的观点会有所变化,那就算与时俱进吧。

本书观点全属个人愚见,真诚地欢迎研究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邓小平百年诞辰即将来临。谨以本书作为绵薄之礼,向他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伟大功绩表示崇高敬意。

作 者

2004 年 4 月 18 日于万寿蜗蜗书屋